

杨义堂作品的成功在四个“发”字

□何建明

我对杨义堂的创作比较熟悉。他出版了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有情感的作家，文字和思想、情感结合在一起，可以写出美好的篇章。他还是一个爱思考的作家，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孔子的故乡，中华民族亟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关注国家风家训，《千古家训》在此时推出，我觉得很有意义。来自孔子故乡，已经是他的一个标签。他还曾在文物局工作，所以他对历史真实有一种敬畏感，文物工作已经成为作家的基本素质。因此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关于义堂的创作，我认为有几个“发”。第一个是“发现”。如何发现是我们作家特别重要的一个素质，能不能发现自己所写内容的特质，这是一个作品立得住的关键，因此发现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我自己的写作有所成功的话，发现也是我特别重视的关键点。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义堂的几部作品，在“新意”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或许跟他的文物和考古工作有关。考古讲究发现，一个作家有没有发现的能力，是决定一部作品的深度、高度、宽度的最关键的素质。

以诗歌的名义输送正能量

——评祁念曾诗集《诗与远方》 □周忠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诗歌创作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历史经验与时代政治，这是因为，任何文艺创作都与历史经验、时代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祁念曾先生的诗集《诗与远方》，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版发行，是向党的百年华诞的献礼。《诗与远方》既是诗人对历史、对时代的思考，也是他对自我内心情绪的抒发，其中，最能代表作者创作主旨的，我以为莫过于其代表作《延安，我把你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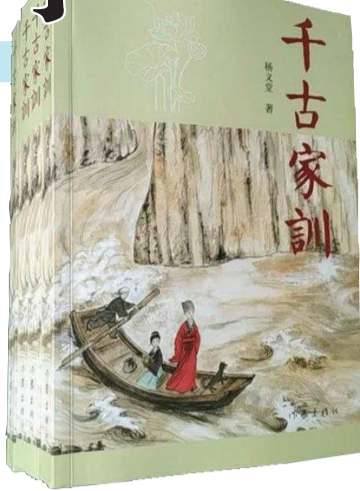
祁念曾1991年在宝鸡工作期间跟央视《话说黄河》拍摄组到延安采访，与十多年前去延安时候相比，当地变化很大。改革开放让延安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变，令作者更感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也不能落后，要不断继承延安精神那股劲。基于这个认知，祁念曾奋笔写下《延安，我把你追寻》这首激情洋溢的诗。

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是革命队伍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克敌制胜、追求幸福的法宝。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发达了，生活富裕了，也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人们为了把社会推向前进，总要开辟新领域，探索新事物，这就必须发扬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曾经是党中央的所在地，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1939年至1943年期间，日军大举“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解放区面临严重的困难局面。但是，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

在延安，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当时延安的生活那么艰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延安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作者追寻延安，追寻的是延安精神。延安历史悠长，文物古迹荟萃。在这块黄土地上，有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地，它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民族滥觞。延安，有闻名天下的黄河壶口瀑布，它雄浑壮美的风姿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民族魂。1935年到1948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篇章。

祁念曾的诗作《延安，我把你追寻》所体现的正是上述观点和思想。这首诗就好像在它抓住了时代精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朝诗人白居易此言，道出了有责任感、具担当意识的文人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的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诉求和志向。祁念曾继承了这种“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提出继承与发扬延安精神的诗歌主题，是对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一种弘扬。他写诗，可谓心与时代合拍跳，笔为人民吐心声。这是他的创作原则，也是他的追求。他的诗作《锤与镰的颂歌》《诗人毛泽东》《南湖红船》《黄河的涛声》《保尔向我们走来》《站立的河流》《永恒的诗魂》等等，都延续了这个思路，风格是一样的豪情激荡、热情奔放。读之，会使我们受到感染，顿觉心胸开阔舒畅起来，并引发许多人生的联想和对人生意蕴的思索。

诗歌，应具有小我与我大我糅合的崇高。诗人，



质如何提高的问题。《千古家训》对我们中国人形象、国家形象的塑造，甚至于对我们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去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我觉得才是最贴切的。

总而言之，义堂的几部作品《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千古家训》等都是大作为，有山东齐鲁大地的风采，又有今天山东人那种气势磅礴的驾驭能力。杨义堂的创作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还可以继续书写，题材上还可以更广阔，不仅仅写历史题材，还可以写现实题材。坚持自己的方向，继续发现、发掘、发挥、发扬，就一定会成功！

不可把目光仅仅投射于自我内心狭隘格局上，要打开眼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土地，让自我忧愁与民族苦难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调，杂糅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多元艺术方法，创作出深沉、激越、奔放的书写“中国经验”的现代新诗来。诗歌写作，其实也包括整个文学写作，说到底，是一种灵魂的书写。古今中外优秀诗歌的价值魅力告诉我们，无论写什么，如何写，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人群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体现，都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延安，我把你追寻》这首诗，让我想起贺敬之的《回延安》。二者一后一前，前后呼应，进而形成了一个精神的赓续与传承，都是对延安和延安精神的致敬和礼赞。

祁念曾的诗作《延安，我把你追寻》乃至他的诗集《诗与远方》所蕴藉的丰富内容昭示我们，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培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畏艰险、奋斗不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延安精神仍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价值和重大意义。具体到文学创作领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诗人把诗写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只有灵魂与诗作产生共情，好诗才有望诞生。诗歌写作，不应只满足于孤芳自赏，而应该为人们带去精神的鼓舞，行动的力量，成为团结人们、鼓舞人们、帮助人们、支持人们的强大正能量。

们提供了一份别具一格的青春书写。费滢曾说，《东课楼经变》是“一篇写青春期但不写爱情，写城市但只写几条马路，写校园但只写几栋楼”的小说，意在反映世界在蜕变。一群处于孤独游荡状态的少年，第一次感到时间流逝的威力，游离于校园主流生活之外，这是一般常人和学校老师所不能理解的，也是我们过去校园生活所没有表现过的。

小说名为《东课楼经变》(汉传佛教里，以绘画形式通俗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为“经变”，用文字讲唱手法称为“变文”)，其实是费滢对现实、对自己青春生活的经变文，或者说是她对现实的一种理解。小说叙述了一个喜欢在校园中闲逛的中学生小费，和一群嬉笑打闹的少年，漫游在即将被拆除的民国初期建筑群之间，漫无目的游走其中的同时也让自己从人群前消隐，和那些被人遗忘的废墟一起，在自外于时间的世界里兀自窥视着人间的种种。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痴迷，特别是对于处于白天与夜晚之间的黄昏的迷恋，呈现出少年的天真、热诚与执迷。小说家的兴趣并不在于给出确定的阐释，而是着迷于时间和空间，以及散落其间的确定的文存。

喜欢逃课的小费，或许希望自己能永远做个隐身游侠，游走真实与梦幻之间，仿佛是汪曾祺小说《晚饭花》《昙花·鹤和鬼火》里的李小龙在当代的复活，渴望看到宿命里的青天一鹤。而东课楼、小礼堂、图书馆终究拆掉，古城亦多的是“未来得及更改”而如今已经无人知晓的名胜古迹，也将一烟消云散，这种对记忆的恍惚，对时空不确定性的疑虑，对自我认知的怀疑，正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典型特征。但是，费滢叙述的重心，也许并非是借一些人或建筑(地点)来营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或者追求现象背后的多重意义，而是要呈现出少年人的生活状态以及面对时空转换的微妙情绪。

《东课楼经变》中的隐身侠小费、游荡鬼苗苗、白鼠少年阿卜、养蛇男孩陆元、货郎陈祥、素描若瓦、机器人钱宗学，甚至与“家中老父”之间有点小小龃龉但又是那么天真温馨，不同于一般青春年少处于与当下决裂的状态，也没有成人与少年泾渭分明的代沟与对立。正因为如此，小说里校园闹剧宛如少年般喜欢在校园星空下放风筝，并对我们说出与众不同的话来：“月亮旁边飞个星星，我便是那个放星人。”

从这层意义上，我们说费滢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又一传人。她那富有节制的温柔与哀伤，旁观者的冷眼观察，以及对文化的天然质朴的敏感，有着汪曾祺的闲适平和之风，有些像明清小说，散发着人间烟火味，又在这日常烟火味里展现出诗与梦的世界。也许，费滢更想要表达的是人，从而达到抚慰人心的目的。其实，这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小说创作，正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独特魅力，也是对汪曾祺文学传统的新续。

今年以来，不少“为党讴歌”的主题诗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尤其是《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的诗歌作品，侧重新时代新征程的主题书写，记录奋斗、创造与巨变，展现史诗般的伟大实践。诗人站在党与时代、党与事业、党与人民的精神高地，关注党史、关注时代、关注事业、关注变化，以宏大的叙事、敏锐的视角和高亢的抒情，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的历史带进人们的视线与心扉，凸显了诗人们的历史自觉、时代感悟与个性表达，尽心尽情抒写新时代的诗意图景。

古往今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了作家诗人的座右铭。这场“为党讴歌”的诗歌行动，诗人把为党而歌、为党而作的主题诗用来“激活”历史，把“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凝聚成诗歌的磁场效应，以激发人们在党的指引下，努力拼搏，奋力争先的豪迈气势。正是通过党史之脉、时代之声和心灵之约，诗人们抒写出具有历史风貌与时代特色、社会发展与艺术风骨相匹配的诗歌作品。比如，刘宏伟的《坐上高铁，去看看青春中国》、李木马的《高铁，大地乐谱》赋予党史的“100站”以风雨兼程和凯歌高奏；王单单的《在飞机上俯瞰花廊坪》、赵之凌的《扶贫：春天的路线》、王太贵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则抒写出扶贫的“中国答案”和“春天路线”；杨克的《听见花开》、邵悦的《大湾区》、吴少东的《长三角，一体化的高唱》、许敏的《长三角：江水与巨轮》描绘出经济特区美丽的“中国之花”、中国经济一体化的“金三角”以及未来的希望之光；宁明的《致敬，大国重器》、黄成松的《大数据之歌》、龙小龙的《以追光者的名义》、芦苇岸的《小康的大地》、马懿的《中国：春风一路浩荡》集中国精神、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之大成；艾诺依的《所有未曾相遇的日子》、王二冬的《飞驰吧，青春中国》则记录了生活与时代“接力者”的青春风貌。

一直以来，主题诗的创作就像是一次高亢的“时代”呼唤，这个“时代”不是应景的、脸谱化的“时代”，而是开启灵犀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与急剧上扬的社会发展与时代感悟“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历史察识与时代体验的言说机制。以刘宏伟的《坐上高铁，去看看青春中国》为例：“是的，又到了启程的时刻/第100站，我还在回味/逝去岁月的风景。已经足够辉煌了/那些诞生于真理中的火焰/星星之火，点燃了那片沉睡的土地/多么辽阔啊，像信仰一样/那些金色的信仰，那些燃烧在/枪林弹雨中的牺牲，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被光阴挖掘出来的闪亮，让我持续地感动”。由此可见，从建党100年到高铁第100站，因为100这个吉庆的数字，诗人将历史轨道与时代进程“无缝对接”，发出了“信仰之光照亮前行的路”的感慨。是的，哪怕是主题诗创作，哪怕像“中国”这个时代母题和艺术符号，都不是简单的“字符填空”，而是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历史透视和艺术生成的结果。也许有人会问：主题诗是否就是被整齐划一地置于时代、历史、现实之中，就是欲使我们的写作变得更加规范化、更加标准化？就《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而言，每一位诗人都有其特有的言说方式，构成了一种主题“解码器”，促使我们对主题诗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说的就是：作为“主题性”的诗歌写作，正好召集了许多诗人的“联合在场”，读者看重的也正是这种“联合在场”的“原生状态”。在这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诗人的“我”，一旦置身于风雨兼程的百年时光，怎样才能从史迹通向高处而不至于沦为简单的记录，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崇敬与担当的驱动下，在“历史尺度”“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要想写出具有“图景张力”的主题诗，诗人不仅要把握史料与时代、现实与经验的关系，还要关注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相容、相生、相对的关系，这样的“图景张力”所呈现出的正是独具个性的历史之光。

追求百年党史与民族复兴的契合点，对接现代文明带来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的又一个核心内容。诗人如何以自己的灵性去感悟百年党史？如何从百年党史中寻得党的光辉历程与辉煌业绩？拿龚学敏的《大江》来说，他抒写着党史的每一个“中国宣言”和“中国制造”：“第一次将满载四川的时代巨轮/驶向世界/最高处的桅杆上高悬着最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一次将天府之国脱贫后的富庶/用集装箱发往互联网的末来/第一次将众多的第一/写成一条大江的骄傲”。这首主题诗一再表明，百年党史与诗人的心灵起了感应以后，它涤荡了诗人的性情和纯粹的内心世界。伴随民族复兴的步伐日益加快，《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还出现了一些“高峰体验”的作品，这些作品大胆地迈向哲学与生命的思考。龙小龙的《以追光者的名义》中，新工业、新技术、新材料已进入新时代的“诗歌大道”：“硅，大自然存量最多的元素之一/每一颗砂，都像一枚刚毅而方正的中国文字/都在沉寂中呐喊/亿万光子在多相态流中转型”“正是这无数花瓣构成的红色源流/滔滔不绝的雅鲁江和金沙江/让横断山脉中的每一座城池/每一块石头，都有了合金的硬度”。这几年，龙小龙写新工业诗备受关注。他摒弃了用“公式化”来“填写”一些新工业名词的写法，不再去抒写没有任何人问烟火味的新工业诗。在他看来，新工业、新材料也是有灵魂的、有旨趣的。他的新工业诗歌的旨趣在于：新工业诗歌所配置的“诗歌菜单”不完全是辛劳、忍耐、知识和智慧，还有与之相映的情感、情怀、情味和情势。

的确，主题诗写作需要开启内在的“精神推动力”，它与旺盛的生命力、感悟力形成“合力”，最终形成了主题诗的言说机制。应该说，从“定型”这个层面上来说，主题诗写作就像是树立一座雕塑，要的就是雕刻出情感的纹络和思想的肌理。一首有主题“棱角”的诗，往往能够在准确的意象“穴位”、延拓的意境“时空”、质感的思想“肌理”、直观的精神“立面”上用力。王二冬的《飞驰吧，青春中国》中，每一分钟的运输配送之路，都是快速小哥最真实的维度。可以说，主题诗也是丰富的经历和敏锐的察识融渗而成的，尤其是谙熟历史与时代所积蓄的“素养”给了主题诗极其广阔的表达空间：“从前慢的岁月，一本书还未读过半/驿站就倒塌在风雪里，跑瘦的马和自行车/眨眼间，就落满了尘埃/没有翅膀的合同要几个夜晚，字迹泛黄前/共赢的手才隔空握在一起”。按王二冬写主题诗的“等身”效应，作为快速小哥的他，不仅活在现实中，而且还“活”在主题里，他就是要以“等身”的感悟，把人带进一个可临的历史、可摸的现实、可触的视角、可探的时间，共同组成一个青春中国的“历史图景”和“现实法则”。

应该说，新时代的诗人都有一种观察时运与关注社会的习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价值、生命尊严都值得去书写。如今，诗人作为时代风貌、现实气场、历史场景和精神价值的“观察者”，已经显示出非凡的雄心与气度。比如，胡丘陵的《历程》为党史谱写波澜壮阔的“进行曲”；孙凤山的《中国红船与中国长征》呈现出百年党史的“标配”；王自亮的《长江九章》将一个民族进步的“时速”与“浪花”完美呈现；谈雅丽的《青春·湘江北去》、刘立云的《志愿军》以凹凸有致的刀法凿出中国革命先驱的“英雄群雕”；陈勇的《大道阳光》则呈现出百年大党坚韧不拔、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龚学敏的《大江》以蓬勃的气势书写党史中的“中国志”；曹宇翔的《黄河诗篇》将民族之魂和盘托出；高鹏程的《蔚蓝》将党史中的“原像符号”与“政治生态”交相辉映。此时此刻，大江不再是大江，重器不再是重器；数据不再是数据，田野不再是田野。听，民族复兴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

如今，人们一谈主题诗，绕不过的就是诗歌“辨识度”的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主题诗本有的“命题”与“命名”，其辨识度不是早已存在了吗？其实不然，我们所讲的辨识度，不是“共相”的辨识，而是个性的辨别，是属于诗人个性化的艺术表达。主题诗创作，我把它归结为“规划性”写作。我以为，大而言之为“时代意识”，小而言之为“主体意识”。《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作品已紧紧地串联出：时代意识——主体意识——历史气场等“主题链”。可以说，新时代的主题性诗歌创作与建设，就是要不断增强诗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构筑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力量；就是要强调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最大化的诗意表达。因为我们有“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有“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有“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有“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有“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这些就是我们所要的诗意表达。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少年心性与人天气息

——费滢小说集《东课楼经变》谈片 □孙生民

地域经验如何进行文学表达，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处理，作家们如何以自己的才情、学识以及信念价值来表达对急速变动的现实的思考？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以汪曾祺为旗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小说家们，都用其各自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回应。如果一定要概括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审美特质的话，那么，风俗画、少年成长主题、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描写、文人气息、散文化风格等应该是其主要旋律。

作为“80后”作家，费滢曾获得多项华文文学奖殊荣，她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在文坛引人注目，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后起之秀当中的“异数”。但透过她小说语言的密林和似真似幻的叙述，不难发现在她为数不多的散文小说里，在少年视角里，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在日常生活的片段描写中，表达的是对诗性人生的向往，而这彰显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趋向。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东课楼经变》就是最好的明证。

小说集《东课楼经变》除了辑录同名中篇小说，同时收录了《佛说naga救疾》《朝天宫》《鸟》三篇小说。这四篇小说，可以说都是以少年眼光来表现少年成长的主题，其中不乏对同龄人、贩夫走卒及日常生活诗意的叙写，更多呈现的是对自我认知、生命、时间、孤独、自由、文化等满腹少年心性的思考。当然，这些少年都有点老成，但少年心性，散落在金陵文化传统里，这些“非规矩”的少年成长小说，故事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每个细节仿佛都是真的，在对城市地点、时间、记忆、事情的腾挪闪回的叙述里，一种独有的散文化小说的趣味和腔调就产生了。

小说《鸟》是写一个14岁少年在初中毕业前后这一转型敏感的时期所遇所思所感。全篇以少年的眼光来写。“他”与同学D君厮打斗狠又情同手足，但遗憾的是D君将到异国他乡留学，想与D君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似乎成了多余。“他”的妹妹小F寄养在乡间外婆家，彼此电话交流前言不搭后语，也言不由衷。“他”与爸爸交流也谈不上有多大障碍，但爸爸似乎又不完全理解他。这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对生活的周边世界充满好奇，对菜市场的动物们充满一腔怜爱，为养死的小动物伤心落泪。终于有一天，少年因说不出情愫从卖鸟人手中买来一只脚上扣了线的鸟，“他想有一天，这鸟儿能在他

用力蹬车时站在他的肩膀上”一起出游。但一想到鸟没了自由，就像“他”一样，“他”最终放飞了鸟，如处理一段未知之友谊和消失的生命气息。这种少年成长的叙写，言有尽而意无穷。

小说《佛说naga救疾》主要写“我”与在异国他乡留学的病友naga相依为命的一段生命历程。开篇的神话传说应该是为小说“让渡人生”提供了底色。在看似轻松、貌似风趣，甚或调侃里体验了时间、生死、孤独、友谊等人生的要义。由于背景放在异国他乡，在不同文化价值和观念参照里，就更加凸显了人在某种不可知境遇里对于生命的多元思考，自然也表现出人成长过程中命运的无奈、乖张与悖论。

小说《朝天宫》主要写小F与古玩贩子们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小F成长心得和人生追求。对于古玩，对于人生中诸多美好事物，“不过是过手如云烟，过眼即拥有”。小说里的人物由小F视角一一写来，喜欢练字的刘大年，卖古玩的马叔权，古玩贩子、白脸书生小庄，卖凉粉、馄饨的小陈，精明而不失风雅的海人王二毛，以及擅长拼接旧瓷片、但只能以理发谋生的李推子，不一而足，这些人无论外貌、神情、言语做派，还是他们的人生，与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人们拉开了距离，但都被写得活灵活现，颇得汪曾祺《异秉》里的神韵。如果再深究的话，小说里这些古玩商贩们，文人程度普遍不高，甚至不识字，类似于汪曾祺《鉴赏家》里的果贩叶三，是些颇具慧眼的鉴赏家。虽做着古玩买卖，或者其他生意，但他们个个都是古玩界的现世知音，有着对美与文化的天然秉赋。小说表面写他们买卖古玩或者做其他生意，其实是叙写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理想，是在精心构筑一种自由、惬意、闲适、洋溢着文人气息的人生境界。小说以南京朝天宫为背景，涉及朝天宫格局以及其他地名历史，这些写景写历史都是为了营造氛围。按照汪曾祺小说理念“氛围即人”，朝天宫，也许是费滢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至于小说里对古玩的知识考古学式的介绍，以及颇为传奇的医方，更为小说增添深厚的文人气息，表现了一个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传统。

关于《东课楼经变》，许子东说它是“后现代哈利·波特”。其实，还不如说是中国式的《麦田守望者》，费滢为我

抒写新时代的诗意图景

——从《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想到的 □卢辉